

知天論述與政治諫言：從連續提問 略談〈天問〉的寫作策略*

鄭 兆 宏**

提 要

〈天問〉全篇有問無答，不僅是中國文學史的特例，放眼世界亦是少見的作品；雖然疑有錯簡，但仍可見其先「天道」後「人事」並收束於楚國事的結構。本文並不聚焦於歷代學者對於〈天問〉的錯簡、作者或創作動機的討論，而是將其置回創作當下的戰國語境，強調同時代的作品與〈天問〉的形式、內容多有關

本文 113.09.15 收稿，114.01.20 審查通過。

* 本文原為吳旻旻先生「楚辭」課程所撰寫之期末報告，曾宣讀於「《中國文學研究》第五十九期暨第四十九屆論文發表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2024 年 11 月 29 日）。論文初稿的發想，感謝吳旻旻老師於課堂上細心指導，又幸得《中國文學研究》編委會邀請三位匿名審查人以及擔任論文發表會討論人的錢瑋東學長賜予寶貴意見，使本文能夠更趨完善，謹致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DOI:10.29419/SICL.202502_(59).0002

連。首先從特殊的「連續提問」形式切入，強調設問兼押韻的修辭手法能夠有效吸引預設讀者的視聽。再者說明戰國時代君王對於「天」的好奇，分析整篇文章並以時空相近的出土竹書、傳世文獻說明〈天問〉先天道後人事的「知天論述」結構合乎戰國時期的潮流。最後，簡述〈天問〉人事部分以連續提問作為有效的寫作策略，呈現規勸君王慎戒修德的政治諫言。

關鍵詞：天問、政治修辭、知天論述、出土文獻

Heavenly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Admonition:

The Rhetoric of Continuous Questioning in Tian Wen

Cheng Chao-hu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ian Wen” (天問), a poem included in the “Chu Ci” (楚辭). The poem consists entirely of questions without answers, establishing it as not only a unique cas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a rare example worldwide. Despite suspected textual dislocations, its structure remains discernible, progressing from inquiries about the way of heaven to human affairs and ultimately concluding with matters related to the state of Chu.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its remarkable rhetorical technique of “continuous questioning,” which uses interrogative phrasing and rhyme to efficaciously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its intended audience. The second section explores Warring States rulers’ curiosity about Heaven and analyzes “Tian Wen” in relation to contemporaneous excavated manuscripts and transmitted texts, demonstrating that its “knowing heaven” structure, with its transition from the way of heaven to human affairs,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ligns with the intellectual tren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how the section on human affairs employs continuous questioning as a strategic writing technique to convey political admonition, urging rulers to govern with caution and virtue. This study moves beyon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nd recontextualizes “Tian Wen” within the intellec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ighlighting how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currents shaped both its form and content.

Keywords: Tian Wen (天問), political rhetoric, knowing heaven, excavated manuscripts

知天論述與政治諫言：從連續提問 略談〈天問〉的寫作策略

鄭 兆 宏

一、前言

英國劍橋學派昆廷·斯金納在《政治的視野》一書中強調：「所有的文本——即便是最為抽象的哲學著作——都可以在本質上被理解為對既有對話或論辯的介入(intervention)。為了理解這些文本，你需要確定其意欲介入的特定論辯，進而確定其可被視為答案的特殊問題。換言之，我並未徹底區分哲學與意識形態。在我看來，就算是最為抽象的文本，探詢其作者說那些話究竟是想做什麼也是值得一試的做法。」¹ 也就是說，研究者不應該只關注於文本作者說了些什麼，作者的談論目的也相當重要。依此理路回顧〈天問〉，我們不應該只是關注於其引用的神話傳說並以此增進古史知識，仔細考察作者創作文章的原因也是或更是研究的進路之一。

¹ 〔英〕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著，王濤等譯：《政治的視野·第一卷：論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年)，頁iv。

關於〈天問〉之寫作目的，東漢王逸〈天問序〉所言的「以潔憤懣，舒瀉愁思」可說是最早的解釋，² 歷來注家也各自提出不同的說法，根據張德育〈略談〈天問〉的幾個問題〉的整理，大致可以分為抒發憤懣、諷諫君王、窮究事理三種。³ 即便三種說法大相逕庭，但都可以透過文本找到符應的內容而說得通；雖然三種說法都說得通，卻也都不完備。因此本文將〈天問〉置回戰事頻仍、各國攻伐的戰國時代，聚焦於「連續提問」形式的修辭特質，思考其獨特的同時是否也符應了時代潮流或文化脈絡。為了更全面地關注文章，接下來首先簡述〈天問〉整篇的脈絡，再分別說明其如何在先秦語境中展現豐富的特色。

〈天問〉的結構大致上是先言「天道」，後敘「人事」。⁴ 雖然從漢代開始文本便已經出現「文義不次序」的狀況，但〈天問〉整體的次序是很顯然的，⁵ 文義略有不通的問題並沒有巨大到需要以錯簡為由重校〈天問〉的字句順序，⁶

²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123。本文所引《楚辭》皆出於本書，為求簡潔不一一加注。

³ 張德育：〈略談〈天問〉的幾個問題〉，收入中國屈原學會編：《楚辭研究》（山東：齊魯書社，1988年），頁282-303。近代也有不同觀點的學者，如王欣慧認為〈天問〉是用以教導貴族子弟的提問型知識百科。王欣慧：〈明法度與厲國子——〈天問〉體制與性質再探〉，《抒情之外 屈騷再詮》（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79-152。

⁴ 湯漳平：《楚辭論析》（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35。顧頡剛也以類似「天道」的宇宙與「人事」說明〈天問〉。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250。彭毅也認為「〈天問〉全篇內容大體可分為兩個部份，前部份是問自然的天」，「後部份在問人格化的天」。參考彭毅：〈楚辭中幾種信仰之隱現及其特質〉，《先秦兩漢學術》第5期（2006年3月），頁217-259。

⁵ 明代林雲銘便認為〈天問〉的「次序甚明」，不過其實有些部分的次序難以理解，因此筆者主要參考陳子展較為折衷的說法。參考明·林雲銘著，于淑娟點校：《楚辭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61。陳子展：《楚辭直解》（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512。

⁶ 歷代學者幾乎都基於王逸《楚辭章句》的文字次序進行解釋，直到清末民初才開始有各家學者進行字句的重新排序，實際的次序在更多證據出現前難以判斷，故本文依循洪興祖之說。下列筆者所見修訂順序之學者：清·屈復：《楚辭新注》，收入《叢書

故筆者仍依王逸《楚辭章句》的文本，將「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至「羿焉殢日，烏焉解羽」視為談論天地形成的「天道」方面問題；「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至「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則是對於歷史興衰的「人事」疑問。

上述對於文本的區分主要基於問題的內容，至於連續疑問的形式部分，藤野岩友認為：「〈天問〉開頭對宇宙問題的連續發問始終是以疑問的語氣進行……然而，到了末尾敘事楚國之事的發問的語氣性質起了明顯的變化，由單純的疑問轉變為連續的反問。」⁷ 注意到前段「天道」與後段「人事」的設問形式雖然都是連續提問，但問的方法仍表現出具體的差異。小南一郎〈天問篇の整理〉則進一步結合疑問句的內容與形式，強調關於「天道」部分的疑問形式都是四字句為主，以兩句四字句且組成一聯，兩聯則為一單位，如「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人事」的部分則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前二句為四字敘述，後二句的字數有所變化並提問，敘述的一聯與提問的一聯組成一個單位，如「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另一種則是上四下三的方式組成一聯，重複而為兩聯組成一個單位，一聯之中前四字陳述、後三字發問，如「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⁸

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98冊。蘇雪林：《天問正簡》（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孫作雲：《天問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郭世謙：《屈原天問今譯考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日〕赤塚忠：〈『楚辭』天問篇の新解釈〉，《赤塚忠著作集第六卷 楚辭研究》（東京：研文社，1986年），頁177-354。

⁷ 〔日〕藤野岩友：〈天問と卜筮と〉，收入〔日〕藤野岩友：《增補巫系文學論》（東京：大學書房，1969年），頁281-296。中文版參考〔日〕藤野岩友著，韓基國譯：《巫系文學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頁207-219。

⁸ 〔日〕小南一郎：〈天問篇の整理〉，《楚辭とその注釈者たち》（京都：朋友書店，2003年），頁173-247。需要注意的是小南一郎不言「天道」與「人事」，而是分為「神話」與「歷史」，並將「薄暮雷電歸何憂」至「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視為亂辭，筆者則將其納入人事考慮。

連續不斷的疑問中，基於「天道」部分的提問方式平穩，內容也多為宇宙構造問題，關注於此的學者便會認為〈天問〉是篇「窮究事理」的文章，甚至試圖為其中的問題提出解答；⁹ 至於「人道」部分的提問方式則多變化，內容關乎國家的興衰盛滅，正如廖序東《楚辭語法研究》的分析：「句法的錯落與詩人所問內容以及伴隨情感的波瀾起伏協調一致。」¹⁰ 聚焦於此的學者們便會認為〈天問〉是篇「抒發憤懣」、「舒瀉愁思」的文章，強調作者對於國家的敗亡有所反應。

只聚焦於「天道」或「人事」僅見部分而未窺全豹，對於一篇文學作品或任何文本，我們應當以能夠完整詮釋整篇文章的方式說明。為何〈天問〉先以疑問的語氣問「天道」，後以反詰的語氣問「人事」，找尋某種能夠同時解釋兩個部分的論述乃是本文期待解決的課題。筆者認為，〈天問〉有次序的結構與戰國時代興起的「知天論述」有關，「天道」部分對於世界的生成與建構連續提問，內容與形式皆能吸引預設讀者；「人事」部分則透過反詰語氣對神話與歷史人物提出質疑，藉此陳述「政治諫言」，示意君主不要違背應當遵循的道理。〈天問〉固然是篇獨特的「奇文」，但回到戰國時期的政治與思想語境，便可以發現「連續提問」的表述形式、先言天道後語人事的論述模式，並非特立獨行的存在而與時代潮流有所連結。

⁹ 唐代柳宗元有〈天對〉，宋代楊萬里則作〈天問天對註〉。見於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註：《天問天對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現代亦有人以現代科學知識解之，如吉家林：《屈原〈天問〉解疑》（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¹⁰ 廖序東：《楚辭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頁194。

二、連續提問的寫作策略

具體討論天道與人事的內容前，筆者需要說明〈天問〉最具代表性的「連續提問」的特質。連續提問是設問的一種，黃慶萱認為「所謂『設問』是一種屬於『刺激』性質的語言」，而〈天問〉的發問「都是內心確有疑問的設問」。¹¹ 強調設問能夠促使聽話者有所反應，進而引人注意與自省。沈謙也說明設問是「刻意設計問句的形式，以吸引對象注意的修辭方法」，更注意到透過「連續設問以製造文章氣勢」的方法。¹² 正如陳怡良〈天問的思想內容及文學價值〉所言：「由於通篇全為問語，顯得句法錯縱變化，而增加其內容的璀璨富麗，奇突不群。」¹³ 〈天問〉連續的「問」確實滔滔不絕，令人目不暇給而能吸引讀者（或聽者）的注意；況且不只連續提問，〈天問〉也透過押韻使得文章具有韻律感，同樣也具有引人注目的特質。以其開篇為例：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首先從「曰」標明文章的開始，彷彿作者即將開始先身說法，接著便透過四字一句，第二句與第四句押韻的規律形式連續提問；¹⁴ 內容則是問聽者如何知道天

¹¹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頁35-37。

¹² 沈謙：《修辭學》（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2年），上冊，頁384。

¹³ 陳怡良：〈天問的思想內容及文學價值〉，《屈原文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306。

¹⁴ 參考王力：《詩經韻讀 楚辭韻讀》（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435。

地開闢之初的事情，開始問到天地未分、晝夜未分、氣化宇宙。可以發現〈天問〉不斷提問的過程有一定順序，從無人知曉的起源到世界萬物，依循著創造的過程描述。〈天問〉整篇雖然並非完全工整的四言，但基本上是按照既定格式押韻並提問，最後總共提出了一百七十二個問題。¹⁵ 雖然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只問無答」，但此種連續提問又押韻以吸引讀者視聽的寫作策略在戰國時代非常流行，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天問〉的疑問形式與先秦作品的關係，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首先關注於《逸周書·周祝解》。方孝岳〈關於屈原「天問」〉認為：「單就屈原〈天問〉這篇體裁來講有些地方和荀卿〈成相篇〉的句調一樣，出於『成相雜辭』，和《逸周書·周祝解》的體裁相似。」¹⁶ 饒宗頤則注意到《逸周書·周祝解》「是篇連續提出問題，亦近為『偏為萬物說』一類，只是句法構造，和〈天問〉頗有不同」，¹⁷ 可以發現二者連續發問的關係值得注意，《逸周書·周祝解》云：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柔剛？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人智之遽也，奚為可測？歧動噉息而奚為可牧？玉石之堅也，奚為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¹⁸

¹⁵ 〔日〕竹治貞夫：《楚辭研究》（東京：風間書局，1978年），頁823-824。

¹⁶ 方孝岳：〈關於屈原「天問」〉，收入杜松柏主編：《楚辭彙編》（臺北：新文豐，2000年），第10冊，頁206-238。

¹⁷ 饒宗頤：〈〈天問〉文體的源流——「發問」文學之探討〉，《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臺北：新文豐，2003年），第16冊，頁35-56。

¹⁸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066-1068。

該文作者先提出幽、明、陰陽、短長、柔剛的二元對立的問句，再進一步落實到真實自然世界中的動物與事物與人的關係並提出疑問，最後的解答是「君子不察福不來」，也就是君子需要理解世界變化的某個根本原因，才能夠有「福」。根據筆者整理，「明」、「陽」、「長」、「剛」都屬陽部韻，「得」、「服」、「測」、「牧」、「刻」、「之」則分別是之部韻或職部韻，¹⁹ 之職韻母接近可通韻。《逸周書·周祝解》不只是連續提問，更藉由韻文的形式吸引讀者。潘振云更注意到連續出現的疑問都具有意義，強調前五問「惡乎如此？皆道之所為也」，表面是問題但其實是透露「道使之然也」的意義，後續問句的「曰何為」、「曰奚為」、「曰孰」，則是為了「設問辭以起其思也」、「發其省也」，²⁰ 疑問其實令人耳目一新，進而誘使讀者反思內容。

再者則討論《莊子·天運》。廖平指出「〈天問〉首一段與《莊子·天運》全同」，²¹ 強調〈天問〉開篇的疑問形式、宇宙內容與〈天運〉有關係；何天行更認為二者「同一目的，而且句法和意義也大抵相同」，²² 也是從形式與內容切入，《莊子·天運》的原文如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

¹⁹ 參考「小學堂上古音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閱覽時間：2024 年 12 月 12 日。

²⁰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頁 1066-1068。

²¹ 廖平：《楚詞講義》，收入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0 冊，頁 370。

²² 何天行：《楚辭新考》，收入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第 74 冊，頁 110。

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²³

此段文字可分為「天其運乎？」至「敢問何故？」一段，全為問句；巫咸的回應則為另一段，屬於回答；問的部分全問自然世界：天、地、日月、雲雨背後的推動因子，世界變化的原因。在連續提問的步步進逼之下，最後由巫咸回答，強調政治需要順應天道才能長治久安，否則便會遭到禍害。除了連續提問的形式，此處亦以押韻的手法寫作，²⁴ 二者確實讓整個文章鏗鏘有力，足以吸引讀者視聽並理解作者藉巫咸之口所言的政治哲學。²⁵

最後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凡物流形〉。作為近年來出土文獻中相當受到矚目的一篇文章，整理者曹錦炎認為：「〈凡物流形〉幾乎可以稱之為姊妹篇的，當屬我國古代偉大詩人屈原的不朽之作——《楚辭·天問》。」²⁶ 開篇提出了四十多個問題，再闡發作者的思想。〈凡物流形〉非常類似於〈天問〉的開篇，發出許多不可解而〈天問〉未談及的疑問，其原文較長，今節錄如下：

凡物流形，奚得而成？流形成體，奚得而不死？

既成既生，奚顧奚鳴？既本既根，奚後之奚先？

²³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商周出版，2018年），頁343-345。

²⁴ 「處」、「所」押魚部韻，「張」、「綱」、「行」押陽部韻，「已」、「止」則是之部韻，「雲」、「勸」分屬文、元部韻，但二者韻母相近可通韻。參考「小學堂上古音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閱覽時間：2024年12月12日。

²⁵ 宋代褚伯秀與明代林雲銘分別從創作者與閱讀者角度說明問與答的關係，注意到答案以簡馭繁，看似沒有一一回應問題卻也以「上皇」概括性完結。宋·褚伯秀著，張京華點校：《莊子義海纂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468。明·林雲銘：《莊子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48-149。

²⁶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22。

陰陽之處，奚得而固？水火之和，奚得而不差？

聞之曰：萌人流形，奚得而生？流形成體，奚失而死？

有得而成，未知左右之情？天地立終立始。

天降五度乎，奚橫奚縱？五氣並至乎，奚異奚同？

……

聞之曰：察道，坐不下席；端文，處不與世。

先知四海，至聽千里，達見百里。

是故聖人處於其所，邦家之危安存亡賊盜之作，可先知。²⁷

前段為疑問的節錄，主要是對於形體構成、生死、陰陽的疑問，第一個「聞之曰」之後更談及人與天地之間的關係；後段則以第二個「聞之曰」開頭，描寫得道之人的神通或力量，只要「察道」、「端文」，即便安坐於席或遺世獨立亦能知曉家國安危。進一步考察其聲韻，可以發現包含「聞之曰」的前四聯（四句一聯）的上下兩聯分別押韻，如「形」、「成」為耕部韻，「體」、「死」為脂部韻；其後押韻方式較為混亂，但「縱」、「同」乃東部韻，²⁸ 其實也還是具有一定規律。同樣可以發現〈凡物流形〉也是先以連續疑問配合押韻的形式，再說明作者想要傳達的道理。²⁹

²⁷ 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585-587、595-596。

²⁸ 參考「小學堂上古音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閱覽時間：2024年12月12日。

²⁹ 關於問與答之間的關係，可以參考淺野裕一、曹峰、顧史考幾位學者的討論，綜合各家說法，筆者認為基於簡帛的最新研究，〈凡物流形〉的問與答有關。〔日〕淺野裕

從天道之問與人事的答來說，曹峰認為《逸周書·周祝解》與〈凡物流形〉基於論述框架以及道用一體的政治哲學，二者具有的相似性不可否認；³⁰ 再加入《莊子·天運》討論，也可以發現透過連續提問並吸引讀者並提出政治道理或哲學乃是三篇文章共同的基礎。〈天問〉其實也是透過連續提問與押韻言及「天道」之事，再繼續透過設問與押韻呈現其「人事」的部分；最大的差異在於〈天問〉的人事仍以「連續提問」的修辭書寫，並未具體以敘述提出政治諫言。

綜合上述文章的分析與比較，可以發現戰國時代確實存在一種「連續提問」並押韻的文章類型，透過修辭技巧吸引讀者再提出學說的寫作策略。有些學者認為《禮記·曾子問》或《黃帝內經·素問》中一問一答以闡發學說的問答體與〈天問〉有關，³¹ 但「連續提問」並不像建立特定講述情境的一問一答，而是以引人矚目的修辭手法吸引讀者閱聽並理解其學說。結合形式與內容進行分析，更可以發現〈天問〉、《逸周書·周祝解》、《莊子·天運》、〈凡物流形〉都以一連串的提問激起讀者好奇並吸引其注意力，最終直接或借他人之口說明作者所欲傳達的學說或知識。

一：〈上博楚簡〈凡物流形〉之整體結構〉，收入周鳳五主編：《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2013年），頁283-326。曹峰：〈上博楚簡〈凡物流形〉的文本結構與思想特徵〉，收入周鳳五主編：《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頁240-265。〔美〕顧史考（Scott Cook）：〈上博簡〈凡物流形〉試解〉，《上博等楚簡戰國逸書縱橫覽》（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46-200。

³⁰ 曹峰：〈從《逸周書·周祝解》看〈凡物流形〉的思想結構〉，簡帛網：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084#_edn9。閱覽時間：2024年6月2日。

³¹ 明代黃文煥認為「〈天問〉同於曾子之〈禮問〉」，游國恩則認為「〈天問〉之義，與〈素問〉略同」。見於明·黃文煥著，黃靈庚、李鳳立點校：《楚辭聽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245。游國恩：《天問纂義》（臺北：洪葉文化，1993年），頁8。

三、知天論述

既然連續提問的文章首段具有吸引讀者注意力的意義，則更需要問：為何這些作品能夠吸引讀者呢？不只是連續提問的形式，內容也應當注意。正如前段所說明，《莊子·天運》、《逸周書·周祝解》、上博簡〈凡物流形〉以及〈天問〉，四篇文章雖然略有差異，但都對於宇宙創造、自然變化進行了連續的提問，表現出對於天的好奇並參與了戰國時期蔚為風潮的論天敘述。需要注意的是，戰國時人對於「天」的求索並不像現代基於純粹理性的科學精神的天文學，而是因為天與人有關、天之運行與人之政治有關。雖然春秋時期的鄭國大夫子產已經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³² 強調關注於身邊真實親近的社會，而非只祭祀不可接近的天；反過來說，也是因為理解天道乃是潮流，才使得子產需要特別強調人道的重要。

其實春秋、戰國、漢代都非常著重於天，無法放棄關注可能會降下災禍的天道而僅言人事。舉例而言，戰國顯學的儒、墨兩家都談天，而論天的目標讀者都是對於政治存在實質影響力的君子或君王，期待閱讀文章的有能者依己之學說施政：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
（《墨子·天志下》）³³

³² 〔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年），頁1596。

³³ 清·孫詒讓著，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206。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³⁴

此處墨子認為社會之所以動盪不安，原因在於君子「不明於天之意」，也就是不理解天的旨意而使得天下「亂」；荀子則指出「天」的運行具有常態，順應而治國則吉祥，逆亂而施政則凶險。二者的文字對於天的論述都表示自然相應於政治，施政者應當透過自家學說認識天，進而理解天並治理國家，符合司馬談所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³⁵ 的評價，即各家學說皆是致力於天下的治理。不過，所謂的「天」究竟該如何理解呢？

「天」的概念由西周時期的人格天在戰國時期逐漸轉移為自然天，³⁶ 但菅本大二注意到，戰國仍存在作為主宰並利用自然現象譴責人的「天」。³⁷ 天的賞罰對現實世界仍有莫大的影響力，對於天的認識與否更直接關係到統治的順與亂，因此為政的王公貴族才會對天存在濃厚的好奇心。如秦末動亂，酈食其向劉邦提供軍事建議時便說：「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³⁸ 將天與王之間的關係作為勸諫的開頭，吸引漢王的注意。雖然天仍有人格天的好惡性格，但正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天」已經具有自然天的色彩，因此透過外在世界的觀察理解自然天而「知天」也成為可能。

³⁴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00年），頁284。

³⁵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2010年），頁1366。

³⁶ 勞思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0年），頁357-358。

³⁷ 〔日〕菅本大二：〈先秦時期「天」概念之形成與展開——以主宰的「天」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1期（2016年12月），頁339-383。

³⁸ 漢·劉向編著，石光英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285-1286。

君王具體「知天」的方法主要是觀察天象與推演數術，³⁹ 前者是歷代建構的傳統，周代初期已經有觀天象之說，曆法的記載甚至占了《尚書·堯典》的一半以上，⁴⁰ 《周禮·春官宗伯》也設立了專門觀測「星辰日月之變動」的官職，以理解天下的興盛變化；⁴¹ 至於後者則是春秋戰國逐步興起，人們透過考究規律性的「數」而能理解天的具體變化，《國語》、《管子》甚至是漢代的馬王堆帛書都能看到類似的說法。⁴² 可以發現「知天」一直都是君王的冀求，戰國時代各國對於「知天」的需要隨著時代不減反增，《史記·天官書》云：

（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⁴³

戰國時代的君臣面對社會的動盪不安，尤其注意預知吉凶的「察機祥」與觀測天象的「候星氣」，期待能夠藉此擺脫兵戎、天災並理解國家禍福。因此，戰國時期渴望向君王提出政治哲學的思想家們，便以「知天」作為論述的內容，希望能以此吸引視聽。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戰國時代齊國騶衍的「深觀」，透過「閎大不經」的語言描述天地之間的變化，藉此告訴君王尚德的重要與治理百姓的道理：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

³⁹ 李零與陶磊分別從方士和史官界定，但可以注意兩個方法都是為了幫助君王的統治。參考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頁4-6。陶磊：《從巫術到數術——上古信仰的歷史嬗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22-129。

⁴⁰ 〔日〕高木智見著，何曉毅譯：《先秦社會與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51。

⁴¹ 漢·鄭玄注：《周禮鄭注》（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卷26，頁9-10。

⁴²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02。

⁴³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492。

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并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⁴⁴

騶衍為了引導政治走上正軌，才以大量文字描述「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並在語言之中隱含國家禍福的「機祥度制」，希望藉此使得君臣治理的良好制度能夠實施。可以發現，騶衍基於君王「知天」的渴望，詳細描述天以吸引統治者注意，使其理解國家的禍福而施行善待人民的政治。⁴⁵ 伍振勳考察了騶衍之說與〈天問〉而指出：「《楚辭·天問》是由『問』構成的『天論』文本，與騶衍的『知天』論述可歸於同一論述類型，均以『深觀』開天闢地以來天地萬物的『所以然』，從而考察其中可能的『機祥度制』（吉凶禍福的原則）。」⁴⁶ 也就是說，〈天問〉的問並不只是戰國時代對於宇宙問題的理性辯論或抒發愁緒，而是能夠從萬物源頭開始言說，滿足君王在新時代中對於預測未來的好奇，最後再具體提出自身的政治建議。

不過論及天地生成之始，再說明政治理念的學說不只見於騶衍之說與〈天問〉，楊博注意到近年整理的楚簡同樣也「通過多種宇宙生成模式的描述」，表現「對戰國社會現實政治的關心」，⁴⁷ 上述談及的〈凡物流形〉便是透過「凡

⁴⁴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 944。

⁴⁵ 陳桐生便認為騶衍的「深觀」就是能觀察到宇宙陰陽的變化，從中推測到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適合新的社會的需要、滿足新的社會心理的渴求。陳桐生：《天柱斷裂之後：戰國文人心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20。

⁴⁶ 伍振勳：〈荀子「天論」的旨趣：「知天」論述的主題〉，《臺大中文學報》第 46 期（2014 年 9 月），頁 51-86。青木正兒也注意到〈天問〉的「天」如騶衍談「天」之說，都同時涉及天地與宇宙。見於〔日〕青木正兒：《新譯楚辭》（東京：春秋社，1965 年），頁 220。

⁴⁷ 楊博：《史之闕文：出土文獻與戰國秦漢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年），頁 104。

物流形，奚得而成？流形成體，奚得而不死」的萬物生成變化開始，推演至「聖人處於其所，邦家之危安存亡賊盜之作，可先知」的施政理念。⁴⁸ 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上博楚簡〈恆先〉也是如此，茲先舉例前者如下：

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釐，陰陽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謂□。

天道貴弱……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以道從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長。聖人之從事也，亦托其名，故功成而身不傷。天地名字竝立，故訛其方，不思相〔當〕。……⁴⁹

李零的校讀已經將〈太一生水〉分為兩部分說明。前段是天道的生成，太（大）一生成水，水與太一作用而生天，天與太一作用而生地，此後天地、神明、陰陽相互成就，最終構成了這個世界，君子能夠理解天地生成的道理則稱之為某個缺字；後段則是人事的政治，作者說明天道喜好弱者的傾向，強調世間施政的道理以及如何在世間知天而保身。可以注意天地生成的部分是一段富有規律結構的語言，天地、神明、陰陽、四時、寒熱、濕燥都透過「復相輔」的方式生成，句式與字數都相同；又從相反的生成順序推演回最初的太一生水，呈現循環反覆道理的同時，亦使得萬物生成具備不斷迴圈的概念。從天道轉入人事後，則是透過押韻的語言表現，⁵⁰ 不只便於文章的傳播，亦能夠使得讀者興味盎然。〈太

⁴⁸ 其中也有談到天地生成，如「聞之曰：一生兩，兩生三，三生四，四成結。是故有一，天下無不有」。見於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頁 600。《逸周書·周祝解》、《莊子·天運》也是類似的模式，只是較為簡短。

⁴⁹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1-42。

⁵⁰ 「長」、「傷」、「方」、「當」同押陽韻，參考「小學堂上古音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閱覽時間：2025 年 2 月 4 日。

一生水〉透過語言文字規律的形式呈現了宇宙生成的具體模式，藉由太一與水的關係說明世界的建構並引入人事的政治，至於上博楚簡〈恆先〉：

恆先無有，樸、靜、虛。樸，大樸；靜，太靜；虛，太虛。自厭不自忍，域作。有域焉有氣，有氣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虛靜為一，若寂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氣信神哉……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歟！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慮？⁵¹

此文從一切最初的「恆先」開始談起，反覆形容萬物未生的狀況，接著推演至重濁下凝者為地、輕清者上浮為天的世界形成；最後則是強調，天下之名都符合法度，透過激問強調「明王、明君、明士」既然想知道此道理，便需要思索而求之。類似於〈太一生水〉，〈恆先〉也是從宇宙起源開始說明，先細緻論述萬物之始擁有的「樸、靜、虛」的特質，再談及天地生成的階段。不過仍可以發現〈恆先〉也具備先天道後人事的兩段結構，曹峰便已經注意到「〈恆先〉講生成論的目的不是為了生成論，而是為了導出相應的政治哲學」，⁵² 也就是說，〈恆先〉的作者其實是期待透過宇宙創造的新奇知識吸引目標讀者，藉此向君王提出心目中的政治思想。

綜合郭店楚簡〈太一生水〉與上博楚簡〈恆先〉，可以發現兩篇文章都顯示出相似的結構與意涵，王志楣亦言：「（兩篇）篇幅相差不遠，論述層次也一致地分成兩層，前半段論道之創生，後半段論人事之用，這樣的巧合是否也算是反

⁵¹ 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頁 234-236、239、247。

⁵² 曹峰：〈〈恆先〉政治哲學研究〉，《上博楚簡思想研究》（臺北：萬卷樓，2006 年），頁 123-148。

映戰國時期，某些社群對道家思想產生了共同議題焦點？」⁵³ 注意到此類的論述與時代潮流有關。漢文帝初年的漢墓中，馬王堆帛書中的〈道原〉也有類似的說法：

恆先之初，迴同太虛。虛同為一，恆一而止。濕濕夢夢，未有明晦。神微週盈，精靜不熙。……明者固能察極，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謂察稽知□極。聖王用此，天下服。⁵⁴

相較於前文，二者都談到「恆先」，且〈恆先〉言「若寂寂夢夢，靜同而未或明」，〈道論〉說「濕濕夢夢，未有明晦」，對於天地形成之初的形容相似，似乎可以看到兩篇文章基於相同學說或思想建構類似的內容。至於形式部分，〈道原〉的語言文字更加修飾，前段的天道部分幾乎都是透過四字句呈現並押韻，後段的人事部分雖然形式長短參差，卻也具有對仗的特色。陳麗桂注意到〈恆先〉主要講道的創生，〈道原〉則鋪衍道的本體質性，但二者在天地未生成之前的「表述相當有對應性」。⁵⁵ 〈道原〉的結構其實也展現了宇宙生成與政治哲學的結合，甚至直接明言「聖王用此，天下服」，強調君王依照作者提出的學說便能夠使天下歸順。傳世文獻的《老子》第四十二章亦云：

⁵³ 王志楣：〈郭店《老子》、〈太一生水〉、上博〈恆先〉的宇宙觀及通行本《老子》的比較〉，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一輯（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年），頁179-202。

⁵⁴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冊，頁189。

⁵⁵ 陳麗桂：〈從出土簡帛文獻看戰國楚道家的道論及其相關問題——以帛書〈道原〉、〈太一生水〉與〈恆先〉為核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期（2006年9月），頁123-14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
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⁵⁶

透過宇宙生成論突出一切基礎的「道」，說明居於下的政治哲學，強調「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的道理以及傳授教導，也是一種以宇宙生成而談及人事的論述。尤其可以注意天的陰陽與人的損益相關，人（尤其是君王）其實是以天為基礎行事，強調天、人具備類似的特質。雖然相較於出土竹書，傳世文獻的《老子》篇幅較為簡短，但兩者都具備先天道後人事的結構，相似之處仍非常明顯。

基於上述戰國時期至西漢初年以宇宙生成推理至人事政治的學說，⁵⁷ 可以理解「深觀」天地的語言描繪、講述宇宙萬物之起源，不只是透過「知天」探求人事之理的論述，更是當時吸引君王視聽的方法。筆者認為，君王期待理解天的本質或宇宙架構進而從中謀求政治的利益，因此諷諫者便會投其所好，藉由「知天論述」吸引君王的好奇心。除了本節所舉的例子之外，第二節討論的《逸周書·周祝解》、《莊子·天運》也具有相似的結構，雖然篇幅較短且以「連續提問」陳述，但都是透過語言文字刺激君王視聽，再提出欲言的政治建議。筆者認為，〈天問〉的結構相當類似戰國時代流行的「知天論述」，「天道」部分鋪排描述天地宇宙生成，輔以連續提問與押韻的修辭手法，使君王對於後續可能的學說與機祥度制懷有興趣，最後呈現作者所欲言的「政治諫言」。

⁵⁶ 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頁37。

⁵⁷ 丁新四討論了簡帛本《老子》、〈太一生水〉、〈恆先〉、〈凡物流形〉、〈道原〉，其中談及各篇文章的結構與政治思想亦可參考。丁新四：《出土文獻與早期道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年）。

四、政治諫言

上述主要說明〈天問〉的「天道」部分，本段則簡述「人事」方面。首先需要解釋的是：從知天論述的「天道」直接轉入國家興衰的「人事」不會太過突兀嗎？況且〈天問〉全篇問句，是否真的提出了具體的政治建議呢？關於第一個問題，先秦時代有所謂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模式，〈天問〉的寫作脈絡則是依循著此傳統進行；⁵⁸ 同時，《逸周書·周祝解》、《莊子·天運》、騶衍之說與出土文獻，也都是從天地宇宙生成的「天道」談至國家政治興衰的「人事」。「天道」與「人事」的连接，對於當時作品而言並不會突兀，反而是建立學說必須闡述的部分。⁵⁹ 至於第二個問題，則是本段主要解決的部分，接下來主要透過具體分析〈天問〉文本，說明作者究竟提出了哪些政治諫言。

朱曉海《漢賦史略新證》論述早期賦作時，已經注意到戰國時代的撰寫者會「取文學形象、描繪生動的方式，期使那些王公大人興趣盎然」，⁶⁰ 雖然〈天問〉是否能夠直接歸屬於「早期辭賦」尚難以定論，但筆者認為二者都透過修辭技巧謀求讀者關注這點則是共通的。許多學者也已經細致考察了〈天問〉所提出的內容，如姜亮夫認為全篇「大抵以戒荒淫、責嬉遊、惜忠良、斥宵小為主旨」；⁶¹

⁵⁸ 史建橋：《〈天問〉的思想內容與結構特徵》（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頁221。

⁵⁹ 陳麗桂已經注意到：「戰國時期的某階段，有一群學者（比如黃老道家學者）可能正流行著以創生與名論為主題，並將名論與政事相結合，作為其思想議題的討論。」陳麗桂：《近四十年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2013年），頁6。

⁶⁰ 朱曉海：《漢賦史略新證》（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81。

⁶¹ 姜亮夫：〈天問問例述〉，《楚辭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331-342。

余崇生則強調〈天問〉後半篇乃是一種「歷史鑑戒錄」，藉以警惕君王。⁶² 結合形式與內容，本節主要舉例說明〈天問〉的「人事」部分不只透過「問」的修辭技巧吸引聽者注意，最後更確實提出了作者強調的政治諫言。

首先分析〈天問〉中對於「天命」的提問。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天問〉作者所相信的天命觀是天有好惡的人格天，並依此諷諫君王。⁶³ 不過除了考察作者的思想之外，更應該說文章的預期讀者也相信這個觀念，因此作品才會將能知善惡的天作為說服依據。〈天問〉中具體談到「天命」的部分有兩條：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關於兩聯的內容，臺靜農《楚辭天問新箋》認為兩聯「含意相同」，揭示說明「天道」之無常，⁶⁴ 作者明顯透過歷史事件，問過去的君王獲得天命卻有終結，治理天下又遭他人代之，並強調天命的賞罰難以預測。若是以陳述的方式說明此概念則非常清楚，但〈天問〉卻是以連續的提問表達，概念模糊的狀況下更使讀者能夠反思如何保有天命。對於天道的質疑看似是否定天，但其實最後仍是勸

⁶² 余崇生：〈「天問」篇探索〉，收入余崇生編：《楚辭研究論文選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頁501-513。

⁶³ 參考彭毅與魯瑞菁兩位學者的說法。彭毅：〈《楚辭·天問》隱義及探討〉，《楚辭詮微集》（臺北：臺灣學生，1999年），頁43-126。魯瑞菁：〈屈原的天人時命觀——以〈天問〉天命觀為開展的討論〉，《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論》（臺北：里仁書局，2002年），頁433-489。

⁶⁴ 臺靜農：《楚辭天問新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80、97。

戒君主戒慎修德，形成一種「但盡人力而不委任天命之基本思想」，⁶⁵ 作者藉由提問隱晦地表達政治諫言。

除了「問」道德的「天命」外，〈天問〉也常透過歷史事件的舉例與質疑吸引讀者並藉此提出政治建議，以夏朝開國的禹與啟為例：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姁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

姜亮夫《重訂屈原賦校注》云：「按此段言禹治水任土有所成功，至於降省，何以傳其有娶塗山之女？而愛閔匹合，求快一鼃之飽之說也。意謂大禹聖哲，何以勤於王家而有此私慾也？」⁶⁶ 第一聯主要問禹何以有正面又有負面事蹟流傳，第二聯則問禹無法滿足的慾望，這點在先秦是一個受到討論的問題，《呂氏春秋·當務》云：「禹有淫湎之意……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⁶⁷ 同樣敘述了禹的缺點。不同的是，《呂氏春秋·當務》乃是敘述，〈天問〉卻為問句，作者以文字寫下問題就像為聽者提出心中的問題，勾起讀者一直以來的「惑」，使得讀者對於文章感到好奇並反思作為君王慾望應當如何宣洩方才恰當。接續而言的夏啟也是如此：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

皆歸歟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⁶⁵ 劉永濟：《屈賦通箋；箋屈餘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22。

⁶⁶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六：重訂屈原賦校注、二招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47。

⁶⁷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03。

此處作者問及啟與益對於禹的繼承權的爭奪。《戰國策·燕策》云：「禹傳益，而以啟任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啟自取之。」⁶⁸ 說明禹看似禪讓於益，實以政治手段令其子啟獲得國家，上博簡〈容成氏〉亦云：「禹於是乎讓益，啟於是乎攻益自取。」⁶⁹ 可證夏朝之初當有軍事的王位爭奪。可以注意到，上述兩段紀載都是敘述性的，但〈天問〉卻透過發問的方式勾起讀者的好奇，「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細緻地詢問啟、益爭奪王位的細節，聽者彷彿可以想見圍繞著權力的激烈競爭；「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則隱晦地提出了「言德業同而成敗不一，然啟立而禹祚流遠」⁷⁰ 的狀況。〈天問〉以提問的方式表達，恰足使聽者反思建功立業的問題。

透過〈天問〉人事部分禹與啟的傳說以及提問的修辭，可以發現作者設問的用意不只是質疑過去發生的事件，更是希望藉此吸引並勸諫預設讀者。上述所舉之例關於國家治理的天命以及獲取政權之鬥爭，確實隱約透露〈天問〉的目標讀者就是當權的君王；作者透過質疑歷史上有名的事件，使讀者在聽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反思當下的施政，旁敲側擊地勸誡君王應戒慎修德。對讀於《逸周書·周祝解》、《莊子·天運》、騶衍之說與出土文獻所言的「知天論述」，〈天問〉的「人事」部分並無提出唯一的真理作為政治諫言，但藉由對於歷史事件的連續提問手法，〈天問〉不只能以令人耳目一新的修辭吸引君王，更藉機提出諷諫，將包裝過的政治建議在押韻的連續提問中安順地傳遞至君王耳中。

⁶⁸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年），頁1059。

⁶⁹ 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頁161。

⁷⁰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六：重訂屈原賦校注、二招校注》，頁249。

五、結語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云：「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⁷¹ 雖然此處所談的乃是文學風格，但也提醒我們《楚辭》既繼承《詩經》以來的傳統，也受到同時代作品的影響。除了形式上的影響，我們也必須注意當時文學產生的背景與政治社會有極大的關係，〈天問〉並不能僅以「題畫詩」、「問題集」思考，反而應該回到戰國時期的脈絡，找到其他相似的例子說明其繼承與創變。回顧張德育〈略談〈天問〉的幾個問題〉將〈天問〉的寫作原因分為抒發憤懣、諷諫君王、窮究事理三種，筆者認為，王夫之所提出的「諷諫君王」是較為令人信服的觀點，⁷² 但《楚辭通釋》只是簡述而無提出可以貫穿整篇文章的論述，也並非關注於〈天問〉獨特的寫作手法。⁷³ 因此本文基於同時代騷衍的談天、傳世文獻中《莊子·天運篇》與《逸周書·周祝解》，以及與出土文獻的〈凡物流形〉、〈太一生水〉等文本的考察，認為〈天問〉模仿戰國時代君王感興趣的「知天論述」結構，先向「天道」連續提問以吸引目光，再藉由反詰語氣表達「人事」的政治諫言。本篇文章的重點關注於「連續提問」的寫作修辭，

⁷¹ 南朝梁·劉勰著，詹瑛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52。

⁷² 日本學者吉富透也以「諷諫君王」為切入角度，但他將〈天問〉的篇名與開頭的「曰」結合，認為開篇乃是「天問曰：……」整篇文章都是上帝對君王的勸諫。這是個有意思的說法，但尚無直接證據印證其假說，且聊備一說。〔日〕吉富透：〈『楚辭』天問篇研究序說——戰國楚簡『三德』の読者対象と「皇天」「后帝」から——〉，《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13號（2009年3月），頁18-40。〔日〕吉富透：〈『楚辭』天問篇の存在意義について——『楚辭』四言の特徴から——〉，收入「『楚辭』と楚文化の総合的研究」編集委員会：《『楚辭』と楚文化の総合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4年），頁147-167。

⁷³ 明·王夫之：《船山全書》（湖南：嶽麓書社，1998年），第14冊，頁273。

也就是「形式」部分，因此對於〈天問〉的「天道」與「人事」論述內容較少充分深刻的考察，關於這部分尚需要更多篇幅的論證，有待未來進一步思索與撰寫。

徵 引 書 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年。
- 漢·劉向編著，石光英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漢·鄭玄注：《周禮鄭注》，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
- 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 南朝梁·劉勰著，詹瑛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00年。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 宋·褚伯秀著，張京華點校：《莊子義海纂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 明·王夫之：《船山全書》，湖南：嶽麓書社，1998年，第14冊。
- 明·林雲銘：《莊子因》，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明·林雲銘著，于淑娟點校：《楚辭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明·黃文煥著，黃靈庚、李鳳立點校：《楚辭聽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清·屈復：《楚辭新注》，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第98冊。
- 清·孫詒讓著，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商周出版，2018年。
-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黃懷信、張戢銘、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天工書局，1998 年。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2010 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丁新四：《出土文獻與早期道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 年。

王力：《詩經韻讀 楚辭韻讀》，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史建橋：《〈天問〉的思想內容與結構特徵》，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年。

吉家林：《屈原〈天問〉解疑》，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

朱曉海：《漢賦史略新證》，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何天行：《楚辭新考》，收錄於黃靈庚主編：《楚辭文獻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第 74 冊。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年。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沈謙：《修辭學》，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2 年，上冊。

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六：重訂屈原賦校注、二招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

孫作雲：《天問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曹峰：《上博楚簡思想研究》，臺北：萬卷樓，2006 年。

郭世謙：《屈原天問今譯考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陳子展：《楚辭直解》，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 年。

陳怡良：《屈原文學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陳桐生：《天柱斷裂之後：戰國文人心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陳麗桂：《近四十年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臺北：五南出版社，2013年。

陶磊：《從巫術到數術——上古信仰的歷史嬗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勞思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0年。

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註：《天問天對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游國恩：《天問纂義》，臺北：洪葉文化，1993年。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冊。

湯漳平：《楚辭論析》，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

楊博：《史之闕文：出土文獻與戰國秦漢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

廖平：《楚詞講義》，收錄於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冊。

廖序東：《楚辭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

臺靜農：《楚辭天問新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

劉永濟：《屈賦通箋；箋屈餘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蘇雪林：《天問正簡》，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 〔日〕小南一郎：《楚辭とその注釈者たち》，京都：朋友書店，2003 年。
- 〔日〕竹治貞夫：《楚辭研究》，東京：風間書局，1978 年。
- 〔日〕赤塚忠：《赤塚忠著作集第六卷 楚辭研究》，東京：研文社，1986 年。
- 〔日〕青木正兒：《新譯楚辭》，東京：春秋社，1965 年。
- 〔日〕高木智見著，何曉毅譯：《先秦社會與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 〔日〕藤野岩友：《增補巫系文學論》，東京：大學書房，1969 年。
- 〔日〕藤野岩友著，韓基國譯：《巫系文學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 年。
- 〔英〕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著，王濤等譯：《政治的視野·第一卷：論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 年。

（二）單篇論文

- 方孝岳：〈關於屈原「天問」〉，收入杜松柏主編：《楚辭彙編》第 10 冊，臺北：新文豐，2000 年，頁 206-238。
- 王志楣：〈郭店《老子》、〈太一生水〉、上博〈恆先〉的宇宙觀及通行本《老子》的比較〉，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 1 輯，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年，頁 179-202。
- 王欣慧：〈明法度與厲國子——〈天問〉體制與性質再探〉，《抒情之外 屈騷再詮》，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22 年，頁 79-152。
- 伍振勳：〈荀子「天論」的旨趣：「知天」論述的主題〉，《臺大中文學報》第 46 期，2014 年 9 月，頁 51-86。DOI：10.6281/NTUCL.2014.09.46.02
- 余崇生：〈「天問」篇探索〉，收入余崇生編：《楚辭研究論文選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 年，頁 501-513。

- 姜亮夫：〈天問問例述〉，《楚辭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331-342。
- 張德育：〈略談〈天問〉的幾個問題〉，收入中國屈原學會編：《楚辭研究》，山東：齊魯書社，1988年，頁282-303。
- 曹峰：〈上博楚簡〈凡物流形〉的文本結構與思想特徵〉，收入周鳳五主編：《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2013年，頁240-265。
- 陳麗桂：〈從出土簡帛文獻看戰國楚道家的道論及其相關問題——以帛書〈道原〉、〈太一生水〉與〈互先〉為核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期，2006年9月，頁123-144。DOI：10.6351/BICLP.200609.0123
- 彭毅：〈《楚辭·天問》隱義及有關問題探討〉，《楚辭詮微集》，臺北：臺灣學生，1999年，頁43-126。
- 彭毅：〈楚辭中幾種信仰之隱現及其特質〉，《先秦兩漢學術》第5期，2006年3月，頁217-259。
- 魯瑞菁：〈屈原的天人時命觀——以〈天問〉天命觀為開展的討論〉，《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論》，臺北：里仁書局，2002年，頁433-489。
- 饒宗頤：〈〈天問〉文體的源流——「發問」文學之探討〉，《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臺北：新文豐，2003年，第16冊，頁35-56。
- 〔日〕吉富透：〈『楚辭』天問篇研究序說——戰國楚簡『三德』の讀者対象と「皇天」「后帝」から——〉，《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13號，2009年3月，頁18-40。
- 〔日〕吉富透：〈『楚辭』天問篇の存在意義について——『楚辭』四言の特徴から——〉，收入「『楚辭』と楚文化の総合的研究」編集委員会：《『楚辭』と楚文化の総合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4年，頁147-167。

- 〔日〕淺野裕一：〈上博楚簡〈凡物流形〉之整體結構〉，收入周鳳五主編：《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發展與轉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出版，2013年，頁283-326。DOI：10.6327/NTUPRS-9789860390322_1
- 〔日〕菅本大二：〈先秦時期「天」概念之形成與展開——以主宰的「天」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1期，2016年12月，頁339-383。DOI：10.29425/JHIEA.201612_(11).0007
- 〔美〕顧史考（Scott Cook）：〈上博簡〈凡物流形〉試解〉，《上博等楚簡戰國逸書縱橫覽》，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46-200。

（三）網路資源

- 「小學堂上古音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閱覽時間：2024年12月12日、2025年2月4日。
- 曹峰：〈從《逸周書·周祝解》看〈凡物流形〉的思想結構〉，簡帛網：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084#_edn9。閱覽時間：2024年6月2日。